

吐蕃钵阐布考*

张 延 清

一、钵阐布起源及其音义

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藏区的原始宗教是苯教（bon）。7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入吐蕃，松赞干布（弃宗弄赞，617—650）命能臣图密桑布札创制藏文。为加快佛教的传播，松赞干布下令开展迎请佛像、建立佛寺、翻译佛经等弘佛活动，标志佛教在吐蕃的正式传播。墀德祖赞（弃隶缩赞，704—755年在位）是自松赞干布以来对佛教持积极态度的又一位吐蕃国王。710年，墀德祖赞迎娶唐朝金城公主，重新恢复吐蕃已中断的佛教传播。墀德祖赞的兴佛举措，为其子墀松德赞（娑悉笼腊赞，755—797年在位）时期的佛教发展打下基础。779年，藏族历史上建成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桑耶寺建成不久，就有7名吐蕃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藏文典籍中称这7人为“七觉士（sad mi bdun）”；“七觉士”的出家标志着藏族有了第一批僧人。

据藏史记载，墀松德赞曾以僧人为“却论”（chos blon，意为僧相），从而使佛教徒取代苯教徒而跻身于赞普近侍之列，为此后佛教徒参与吐蕃政事打下基础。尽管如此，僧人在墀松德赞之世还未参与朝政，这在墀松德赞颁布的兴佛第一诏书中有所反映：该诏书中参与盟誓的官员名单中并未出现僧人的名字。^①

797年，墀松德赞死后，诸子争立，吐蕃政局陷入混乱。墀松德赞幼子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98—815年在位）受到吐蕃业已形成的佛教徒及佛教僧侣政治势力的支持，从而继承赞普之位。当时吐蕃佛教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墀德松赞的师僧沙门娘·定埃增（ban de myang ting nge vdzin），也即吐蕃历史上的两位“钵阐布”之一。

钵阐布娘·定埃增出身于吐蕃一古老的氏族——娘氏（myang），唐代译作“明”或“緌”。这一家族分布很广，东支在工布地区尼洋河流域，西支在日喀则地区年楚河流域，“尼洋”与“年楚”均为“娘”的不同汉字译音。

远在松赞干布祖父达布聂息（stag bu snya gzigs）时期，占据整个拉萨河流域的森波杰弃邦孙与雅砻之达布聂息隔藏布江对峙。弃邦孙措施失当，其家臣娘氏、韦氏（dbavs）、农氏（mnon）、蔡邦氏（tshe pong）等四氏族私下结盟，决定投向雅砻的达布聂息，秘密进行倒弃邦孙的行动。达布聂息死后，其子松赞干布之父伦赞弄囊（slon btsan rlung nam）在娘氏、韦氏等氏族支持和协助下，消灭森波杰，占领拉萨河流域。为表彰娘氏对悉补野赞普的忠心，“南木

*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法藏敦煌古藏文抄经题记及校经批语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S007）的前期研究成果。

①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日伦赞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赏赐娘·曾古者为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一千五百户”。^①娘氏家族娘·孟多热之子娘·尚囊，充任赞普伦赞弄囊内侍扈从之官，随侍赞普左右。尚囊被赞普任命为论布之职，并授予小银子告身。松赞干布时期，娘·尚囊已升任大相之职，受命率军收服苏毗诸部时，“娘·莽布支尚囊以智谋使人、马均不受损伤而征抚敌部，征其税赋，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抚服庶民百姓如同对本部民户，其贤明如此”。但因娘·尚囊后来叛离，娘氏家族获罪遭谴。^②

至墀松德赞时期，娘氏家族复又得势，其标志便是娘·定埃增的出现及得宠。娘·定埃增，又名娘·定增桑布（myang ting vdzin bzang po），是印度高僧、得大成就者无垢友的嫡传弟子之一。无垢友是由墀松德赞派人由印度迎请入藏、协助莲花生传法的得道高僧，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鼻祖之一。娘·定埃增受无垢友亲传，是藏地108位得成就者中的一位。^③定埃增与无垢友一起修建了谐拉康（zha lha khang），即“帽儿寺”。

定埃增在墀松德赞的兴佛举措中，以僧侣的身份崛起，达到“却论（chos blon）”这一层级。谐拉康碑甲记载：“班第·定埃增为人自始至终忠贞不二。予幼冲之年，未亲政事，曾代替予之父王母后亲予教诲，又代替予之舅氏培育教养……予窃思之，参比往昔宫庭表册，施予相应之惠，而班第本人，持臣民之礼，遵比丘之规，不肯接受。”^④此碑为墀松德赞子墀德松赞所立，坐落在西藏谐拉康，故名谐拉康碑。墀松德赞选择高僧娘·定埃增为王子的师僧，反映出吐蕃王族兴佛的决心。当然，这与定埃增出身于吐蕃古老贵族的身份也不无关系。

墀德松赞即位后，重用娘·定埃增，同各种势力集团举行君臣盟誓，稳定政局，并极力争取与唐朝讲和，巩固对各属部的控制。墀德松赞在几次兴佛证盟的誓文，如墨竹工卡“娘·定埃增证盟碑（谐拉康碑甲）”、“娘·定埃增续盟碑（谐拉康碑乙）”中，表彰师僧娘·定埃增支持他继承大业的殊勋。谐拉康碑甲西面碑文记载：“（娘·定埃增——编者按）及任平章事之社稷大论，一切所为，无论久暂，对众人皆大有裨益。”^⑤这就说明娘·定埃增的身份地位，已达到同平章事的层级。

紧随定埃增之后，另一位钵阐布是贝吉云丹。云丹后来居上，排在定埃增的前面，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墀德松赞兴建噶迺寺（dkar chung rdo rje dbyings kyi lha khang）后颁布的兴佛诏书中。^⑥该诏书列有当时所有宣誓兴佛官员名单，其中位列所有官员首位者，为沙门参议大诏命，即以沙门身份参知政事。在这一级的有两位，排名在前的就是沙门勃阑伽云丹，即贝吉云丹，其后方为沙门娘·定埃增。排名在沙门参议大诏命之后者，为宰相同平章事，领衔者为首席宰相（blon chen po）尚没庐乞力苏然夏（zhang vbro khri gzu ram shag），排其后众相共有五位。^⑦从上述盟誓官员之名位顺序看来，此时吐蕃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即在原有的众相体制上，多出一

① 王尧、陈践译注：《赞普传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1、162页。

② 王尧、陈践译注：《赞普传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59、145、164页。

③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原文转写：“…myang ting vdzin bzang po…de ltar grub thob brgya rtsa brgyad la…”，译文：“……娘定增桑波（即定埃增）……等一百〇八位得成就者……”

④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⑤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16页。

⑥ 诏书内容参见《建多吉英寺及颁布兴佛诏书》，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誓词内容还可参见《噶迺寺建寺碑》，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52—163页。

⑦ 参见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级沙门参议大诏命。而这一任职，超过原为人臣之首的首席宰相，意味着高僧所拥有的地位已取代传统首席宰相的职权，成为真正掌握大权的新贵。此为吐蕃前所未有的措施，系墀德松赞一朝的创举，实属崇佛政策下的产物。据此，林冠群先生认为“僧相为吐蕃体制外的产物”。^①

钵闍布贝吉云丹，真名勃阑伽云丹（bran ka yon tan），出生于勃阑伽氏（bran ka），^② 吐蕃时其家为下部五茹之千户。关于贝吉云丹后来居上、排在定埃增前面这一问题，藏、汉史籍均无记载。从常理来说，定埃增是赞普师僧，而且是力保墀德松赞继位的功臣兼元老，受墀德松赞的特殊尊宠，赞普也数次为他勒石记功，这在吐蕃历史上是仅有的。但由于定埃增虔敬佛法，不喜俗务，因此退居第二，与贝吉云丹一道辅佐朝政。吐蕃朝堂之上，佛教界的势力显著增强。

有关“钵闍布”称谓，《新唐书》记载：“钵闍布者，虜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③ 即钵闍布是吐蕃参与朝政的佛教高僧。娘·定埃增和贝吉云丹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钵闍布”。唐蕃会盟碑正面右侧第9行藏文转写如下：“ban de chen po dpal chen po yon tan”，与之对应汉文碑文如下：“□□□□□政同平章事沙□□□□□”。由于历经千年风雨剥蚀，原碑汉文有十二处字迹无法辨认，王尧先生根据汉藏史籍记载补出后缺的六个字：“□□□□□政同平章事沙门钵闍布允丹”。经过对比考证，王尧认为：“钵闍布是藏文 dpal-chen-po 的对音，意译为‘大德’”。^④ 陈楠的观点与王尧一致，她在《吐蕃职官制度考论》一文中根据唐蕃会盟碑残存的汉字，认为“‘沙’字之后必为‘门’，而‘沙门’一定是 ban-de-chen-po 的汉译”，进而认为，“‘钵闍布’几字，即 dpal-chen-po 的音译”。^⑤

但也有一些学者的意见与上述看法相左，如黄文焕先生认为：“钵闍布是吐蕃语‘大僧人’的汉字音译转写。‘闍布’是指吐蕃语‘大’。‘钵’字是‘僧人’，但不是吐蕃语，也不是梵语，很可能是于阗语。”^⑥ 据黄文焕考证，“钵闍布”的藏文对音应该是“ban de chen po”，而不是王尧所说的“dpal chen po”。王森认为：“ban-de-chen-po，班第钦波简称班钦波，《唐书》中之钵闍布、钵掣逋，即此称号之对音。”^⑦ 王辅仁在《西藏佛教史略》中的观点跟黄文焕和王森的看法一致：钵闍布“意即大僧人”，^⑧ 这里的“大僧人”非藏文“ban de chen po”莫属。综合三位专家的意见，汉文“钵”的藏文对音为“ban de”；“闍布”的藏文对音为“chen po”。

笔者倾向于后者，即认为“‘钵闍布’为藏文‘ban de chen po’的对音”。首先，笔者对王尧在对唐蕃会盟碑的考证中根据藏文补出的6个汉字“门钵闍布允丹”持肯定态度。但此处的“沙门”二字是为点出贝吉云丹的身份，其后的“钵闍布”与碑文中的藏文“ban de chen po”

①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有关吐蕃僧相体制研究，参见李方桂：《钵掣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李方桂：《吐蕃大相禄东赞考》，《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陈庆英：《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汶江：《吐蕃官制考》，《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熊文彬：《两唐书〈吐蕃传〉吐蕃制度考证》，《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② 《东噶藏学大词典》中他的名字写作“ban de bran ka dpal yon”，参见东噶·罗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词典》之“ban de bran ka dpal yon”词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385页。

③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0页。

④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4、49页。

⑤ 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⑥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闍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⑦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页注②。

⑧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相对应,而不是藏文碑文“dpal chen po”的对应翻译。其次,如王尧所言,“dpal chen po”的准确翻译应为“大德”,而且“dpal chen po”中的“dpal”在字义上也不能直接体现出《新唐书》中所定义的“浮屠”的意思。相反,几乎所有藏文史籍都称呼定埃增和贝吉云丹为“ban de chen po”,这跟汉文史籍完全相符。“ban de chen po”在藏文史籍中有时又叫“ban chen po”,其中第一个字“ban”与“钵”正好对应,“chen po”与“阐布”相对应。而“dpal”却与“贝”相对应,“dpal chen po”,如果音译,只能是“贝阐布”,而不是“钵阐布”;再次,陈楠认为“‘沙门’一定是 ban-de-chen-po 的汉译”,笔者认为不妥,“沙门”只和“ban-de-chen-po”中的前两个字“ban-de”对应,而与其后的“chen-po”两字无关。唐蕃会盟碑中把“dpal gyi yon tan”写成“dpal chen po yon tan”,体现出对当时位高权重的贝吉云丹的尊崇,但也并未忘记在“dpal chen po yon tan”前加上“ban de chen po”,即“钵阐布”。

综上,笔者认为《新唐书》所载“钵阐布”为藏文“ban de chen po”的音译,即“虏浮屠豫国事者”。

二、钵阐布的主要活动

(一) 力促唐蕃会盟

吐蕃跟唐王朝的军事对抗,几乎与吐蕃王朝的历史相始终。墀松德赞时期,吐蕃王朝臻于全盛。唐德宗在唐蕃战争不利的局面下,采纳谋臣李泌“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①的谋略,由是吐蕃与大食交恶,在与大食的战争中失利,元气大伤;进而,回纥也卷入与吐蕃的战争,吐蕃在西域节节失利。“(贞元)八年(792)正月,吐蕃与回鹘战败,征兵与南诏蛮王异牟寻”,^②南诏乘机发兵奇袭,大破吐蕃。由此唐蕃对峙的局面发生重大转折,也标志着墀松德赞盛世的终结。军事上的失败,导致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在赞普的支持下,两位钵阐布在吐蕃全境发展佛教,力图摆脱累年征战所造成的国内人力物力枯竭的局面,进而赢得民心。为缓和与唐朝数十年以来的紧张关系,吐蕃于804年派54人的使团入唐,使团成员中就有代表钵阐布的僧人:“吐蕃使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拔特计波等五十四人来朝。”^③这次吐蕃使团中新增僧人南拔特计波等,作为钵阐布的代表首次参加使团活动,这是两位钵阐布促进唐蕃和平的有力证据。为促成唐蕃早日实现和平,元和五年(810),钵阐布主动提出归还唐朝安乐、秦、原三州之地,唐宪宗李纯为此特赐敕书嘉奖,“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④其中不乏对钵阐布的溢美之词:

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赞)勃藏至省,表及进奉具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⑤

在两位钵阐布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促成唐蕃会盟。长庆元年(821)“九月,吐蕃遣使请盟,上许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西蕃盟会使”。^⑥《册府元龟》记载: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495页。

② 《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 助国讨伐》,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35页。

③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0页。

④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100页。

⑤ 白居易:《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全唐文》卷6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94页。

⑥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第5262页。

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云，汉蕃二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优给衣粮放还。

今并依从，更无添改。预会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①

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唐朝首席会盟专使刘元鼎与吐蕃论纳罗盟于长安之城西；长庆二年，刘元鼎率会盟使团入蕃盟誓。在吐蕃的盟誓时间，从刘元鼎自吐蕃出使回朝后的上奏语词可知：“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帐，以五月六日会盟讫。”^②当时会盟的盛况，《新唐书》略有记载：

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虓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③

早在墀德松赞时，贝吉云丹已排名在定埃增之前，及至墀祖德赞赞普（可黎可足，约815—838年在位）时期，钵阐布贝吉云丹在吐蕃政坛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上述记载中立于赞普右侧的“钵掣逋”应该是贝吉云丹。在贝吉云丹和定埃增的努力与奔走下，唐蕃终于实现会盟，摆脱了长期征战造成的巨大痛苦。

（二）远赴敦煌处理政教事务

大历十一年（776）吐蕃包围沙州，赞普墀松德赞定下围而不攻方略。贞元二年，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④吐蕃占领沙州后，弘扬佛法，提高僧人政治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像吐蕃“钵阐布”一样参与政事。吐蕃进驻沙州后，“赞普以绮心儿代守”，^⑤尚绮心儿由此成为吐蕃在沙州的首任行政长官。尚绮心儿出身于崇佛派没庐氏（vbro），驻节沙州期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圣光寺：

黄金布地，白璧邀功，进直道以事君，倾真□而向佛。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造圣光寺一所。圣主统三光之明，无幽不照；令公承九天之宠，肱股春阳。近沾圣德之弘，远沐恩晖之重。率宾咸服，观国之光，烛赈流沙，称圣光寺也。^⑥

在英藏敦煌文书S 5677号背面《僧尼数书》中记载圣光寺院有僧七人，其事当为初建时期，因此人数较少。S 4914号《卯年九月转付佛经帐》中也记有圣光寺，可见圣光寺已渐具规模。除建造佛寺，尚绮心儿还时常为沙州寺院布施财物。^⑦

钵阐布虽身在拉萨，却关注敦煌佛教事务，由吐蕃沙州节儿代为向寺院捐物，法藏P. 2583（2）记载：“莽没热节儿为钵阐布福田施麴陈绢一匹”。随侍赞普左右，身兼宗教和政务大权于一身的钵阐布贝吉云丹主持完成唐蕃和盟后，于公元826年前后与定埃增一道远赴敦煌，处理

① 《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 盟誓》，第11532页。

②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第5264页。

③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102页。

④ 参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⑤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101页。

⑥ 《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本文所引“绮心儿”、“尚绮心儿”、“上乞心儿”、“尚起律心儿”均为藏文“zhang khri sum rje”的不同音译。

⑦ 法藏P. 2583号背面文字：“……□月九日宰相上乞心儿及论勃颊藏福田，捌头牛，价□麴尘绢两匹绀绀叁匹，紫绫一匹折绢三匹，每牛一头绢一匹”。参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244页。

吐蕃在西域的事务。敦煌市博物馆藏 Dh. t. 0328 有一段文字记载钵阐布贝吉云丹亲自过问敦煌事务的书信：

ban de chen po dpal gyi yon tan gI^① zha sngar reb kong mdo brtsan dang gnang btsan legs gyI mchid gsol bav chen po dgung dang mtshungs pavI zha snga nas ring mo zhIlg du yang zhal ma mthong na thugs bde bar smon te mchId yI ge las gsol zhing mchIs na vdrul bavI vdab las bkav stsal par ji gnang de ltar gnang gIs

译文：钵阐布贝吉云丹阁下：热布贡（地名，今青海同仁）朵赞和囊赞勒致信，好久未见尊贵的大人您，不知大人您贵体可安？特写信愿您身心愉悦。万望通过信差发来指示。照准！钵阐布贝吉云丹亲赴敦煌，除处理政务外，另一目的就是兴佛。法藏 P. t. 1653—1《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背面有一则有关贝吉云丹负责吐蕃在河西宗教事务的珍贵记载，录文转写如下：

ban vde chen po……

1. ban vde dpal gyI yon than gyi zha sngar/
2. chos kyi go chavI mchid gsol bav//
3. mkhan po chen po dgung dang vdrav bavI zha snga nas/thugs bde vam myi bde mchid gsol zhing mches
4. nav//bkav stsald pa tsam du ji gnang//bdag ngan pa dge vdun gyi tha ma zhig mchis pas/
5. rngo thog cIng skul dpen pa ma mchIs par vdI skad du gsol zhing mchIs nav bkav myi vbb du ji gnang
6. bdag ngan pa sngon leng cuvi gnas brtan vtshal vtshal ba las//nong bavI skyon ma mchis par
7. ban vde gzhi vdzin gyis phyung lta zhig bdag la skyon
8. mchis sam (ma) mchis/dge vdun phyogs rmas na/
9. yang mchid gyi□n rma zhing bdag tsham zhig
10. gnas brtan son vtshal par ji gnang/
11. myi gnang ngo/

译文：钵阐布……确吉廓甲致函（钵阐布）贝吉云丹阁下：不知勘布大人近日贵体安泰否？请来函告知。贫僧乃僧团中之卑微之人，生性愚钝，并无过人之处，恳请大人来函赐教。贫僧曾在凉州任上座多年，并无过失，却被主持逐出，贫僧是否真有错，可从其他僧众（相问）。□贫僧能否恢复上座之职？请赐复！不准！

从这封信函及贝吉云丹的批复情况得知，这位确吉廓甲（chos kyi go cha）原是凉州僧团的上座。据法藏文献得知，他还是敦煌经卷的大校阅师，且与毗卢遮那大师一道参与佛经的校对工作。法藏 P. t. 1583《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正面第7栏有确吉廓甲的校经题记：

gu rIb □□ bris/aIm deng zhus/ban de chos gyi go cha zhuso zhus chen lags so//zhu chen lags

译文：格里布·□□抄，阴木丁校，沙弥确吉廓甲校，已做了大校阅，大校阅讫。

该经叶背面还有吐蕃大译师毗卢遮那的校经题记：

be ro tsa nas zhus

① 大写“I”表示反写的元音“i”，下同。

译文：毗卢遮那校。

跟毗卢遮那大师一道校对佛经，可见他能在凉州任上座并与僧相云丹直接通信，是有原因的。然不知何故，他被寺院主持逐出，不得已到敦煌，上书钵闍布，请求恢复其上座的职位，遭到钵闍布的拒绝。说明这位凉州僧团前任上座可能在凉州犯下重大过错，失去钵闍布对他的信任，重返上座职位的希望落空。

法藏 P. t 1588 是卷轴装的《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其背面有一则珍贵记录，是贝吉云丹发来的任命函，录文转写如下：

ban vde chen po yon tan gyi mchid□bu/ nga kha rgo steng la stsal pav//

译文：钵闍布云丹来信，封赐给我“快嘴”之职。

此处的“快嘴（kha rgo）”具体所司何职尚不得而知，单从字面意义来看，钵闍布云丹任命的此人应该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可能是讲经师或翻译之类的职务。从上引求职信和任命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贝吉云丹主持吐蕃西域宗教事务属历史事实。

据藏文史籍《语合二章》（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记载，墀德松赞于马年（当为公元814年）发布文告，命令两位钵闍布组织蕃僧和梵僧，将梵文佛典译为藏文，统一译例，厘定语词，编成目录。^① 藏经洞出土大量敦煌文献，特别是藏文《大般若经》的抄经题记真实地记录了贝吉云丹和定埃增亲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加抄经事业的史实。甘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娘·定埃增的校经题记有两卷，即敦煌市博物馆藏 Dh. t. 0397 号和 Dh. t. 1234 号。Dh. t. 0397 号是藏文《大般若经》抄经母本的抄、校经题记，共两叶，题记如下：

//khang kog ken bris//lha btsan zhus/ting nge vdzin zhus/dpal gyi sgra zhus/brtan kong gis zhuse//

译文：康国根抄，拉赞校，定埃增校，贝吉扎校，端贡校。

dpev vdi ni weng hyen hyen gis bris te zhuste gthan la phab bo//
/rdo rje zhus so/

译文：这本范本是由王星星抄、校并审定的，由多杰校定。

范本标记（题记前空白处，字体较题记为大）：dpev——（范本）。

在这则题记中，校对人之一是僧相钵闍布定埃增（ting nge vdzin）。抄经母本由他亲手校对，体现了吐蕃朝野对佛教经典，特别是《大般若经》严肃性的高度重视。

甘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钵闍布贝吉云丹的校经题记共有 36 件，其中 Dh. t. 0315 号是《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卷第三至第五品经文，其中的第四品抄、校经题记如下：

vbav hevu hevu gis bris/dge legs zhus/yon tan yang zhus/kang kang sum zhus/dpal gyi sgron ma bzhi zhus/

译文：马猴猴抄，格勒校，云丹二校，刚刚三校，贝吉仲玛四校。

而这位格勒（dge legs）在 Dh. t. 1234 号《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又和定埃增一起校经：

/sag khri legs bris//ting nge vdzen zhus/ban de ye shes gsal gyis yang zhus//dge legs suM^② zhus/

译文：索赤勒抄，定埃增校，沙弥益喜沙二校，格勒三校。

① 《语合二章（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西藏大藏经研究全编大谷大耀监修：《西藏大藏经》第 124 函，东京：东京饗术社，1957 年，第 71—87 页。

② 大写的“M”代表后加字“m”缩写成小圆圈，加在字根上方，下同。

这就印证了定埃增和贝吉云丹是一同赴敦煌校经的。

在敦煌佛典的校经题记中,还出现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的妃子贝吉昂楚的校经题记,这说明同去敦煌指导并亲自参加佛经校对的,除两位钵阐布,还有吐蕃王妃。^①敦煌研究院藏、卷号为 Dy. t. 121 《般若心经》是由吐蕃王妃贝吉昂楚校对过的佛经,其末尾题记为:

dpal gyi ngang tshul zhus

译文:贝吉昂楚校。

法藏 P. t. 1452—21 号《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校经题记:

/shl dze sheng brIs/dpal gyi sgron ma zhus/tsyang legs vdus yang zhus/ngang tshul suM zhus/

译文:史泽恒抄,贝吉仲玛校,蒋勒堆二校,昂楚三校。

在上引 Dh. t. 0315 号中,贝吉仲玛(dpal gyi sgron ma)跟云丹一起校经,而在 P. t. 1452—21 号中她又跟昂楚一块校经。综合上述分析,贝吉昂楚、定埃增和贝吉云丹是一同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与佛经校对的。

在吐蕃当局的极力倡导下,敦煌的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吐蕃前后在敦煌创建大寺院五所,使敦煌寺院数目达到 16 所。英藏 S. 2729 《辰年牌子历》被认为是吐蕃统治之初的辰年(788)僧尼部落的代表按要求上报的名簿,当时沙州寺院的僧尼总数为 310 人。但到归义军初期,沙州僧尼人数已猛增到千人左右。敦煌莫高窟中唐第 159 窟东壁门南所绘吐蕃赞普听法图,就是吐蕃赞普崇佛的形象写照与真实记录。^②

墀祖德赞晚年体弱多病,遂将国政委于大论悉诺那巾(dbavs stag rna can)执掌,从而引起钵阐布和权臣悉诺那巾权力之争。悉诺那巾暗中贿赂赞普身边的女巫及占卜师,散布流言,“诬教相郑喀·白季永丹(即勃阑伽云丹,也即贝吉云丹——笔者注)与王妃觉若萨白季昂楚(即贝吉昂楚——笔者注)二人有私,致使信佛大臣遭受罪谴而被杀”。^③《贤者喜宴》记载较为详细:云流言蜚语传到赞普耳中后,赞普下令“当以法律制裁”。王妃贝吉昂楚蒙受不白之冤后自杀身死。贝吉云丹逃往北地,被悉诺那巾等抓获,剥皮植草,情形极为惨烈。^④贝吉云丹遇害不久,定埃增也被悉诺那巾等杀害。最终,两位钵阐布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附识: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作者张延清,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后。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宋超 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① 有关钵阐布亲赴河西颁赐藏文《大般若经》的情况,参见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222—236 页。

② 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四,图 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另外,莫高窟第 133、158、159、231、237、240、359、360、369 等窟内均绘有赞普图像,其中第 158 窟为“各国国王举哀图”,吐蕃赞普领先;其余洞窟中所绘均为“吐蕃赞普听法图”,时代特征明显。

③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140 页。

④ 参见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